

主持人按语:民国及之前的传统公文,历经数千年,凝结着前人的心血、智慧、经验和教训,值得尊重和潜心研究,扬其精华,弃其糟粕,服务当下。《近代公文研究述评》紧扣“传统公文系统”向“现代公文系统”转变这一核心,全视角审视了近代公文研究的现状、成绩、不足和趋势。《蒲松龄文书工作述略》别开生面,展示了擅于描狐画鬼的蒲松龄关心庶务、精于政事的另一面。《元代圣旨开读和传输》以丰赡的史料和坚实的考证,描述了元代诏令的传输过程,借以论证权力运作和公文流转的密切关系。三篇文章,有点有面,由近及远,虽未成体系,但足以窥见传统公文及文书工作魅力之一斑。

——胡元德

近代公文研究述评

胡元德

【摘要】近代公文处于公文由“古代系统”向“现代系统”转变的过渡地带,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原始档案、文献汇编为近代公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晚清、民国、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重要历史阶段的公文研究,太平天国运动、行政效率改革、洋务运动等“热点事件”相关公文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近代公文研究既具有多学科交叉、学术布点的阶段性等重要特点,也具有系统性不强、深度不够等缺点。该领域的研究正朝着逐步系统化和多学科联合的趋势走向深入。

【关键词】近代公文;研究述评;学术趋势

中国近代史上起鸦片战争,下迄新中国成立,中国近代公文即为1840年—1949年110年的中国公文,包括清末公文(时段为1840

年—1911年,含太平天国公文)和民国时期公文(时段为1912年—1949年,含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中共苏区和革

作者简介:胡元德,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古今公文、文书学、应用文体学、秘书学等。

命根据地公文)。

中国公文自先秦延续至今日,呈现出前后相继但又迥然不同的两个系统,一是为专制王权服务的“古代系统”,一是为民众服务的“现代系统”,两个系统的转换恰恰发生于近代。公文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波澜壮阔、悲壮艰难的中国近代历史,赋予中国近代公文以变革急遽、新旧更替等既不同于古代公文,也迥异于现代公文的鲜明特色。

与古代公文和现代公文相比,近代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漠视,成绩算不上辉煌。但是,它如同一条四季常流的小溪,虽不滂沛,却从未中断,进入新世纪以来还呈现出逐渐蓬勃的气势。

一、研究概况及特色

近代公文研究的基本态势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相关文献资料的汇编整理;二是特定时段公文的研究;三是重大历史事件关联公文的研究。

(一)公文文献资料的汇编整理

由于时代比较晚近的原因,供近代研究的文献史料非常丰富,既有清廷、民国政府和共产党早期机关保存下来的原始档案,也有现代学者对历史资料的汇编。

1.原始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了清代中央档案近千万件,其中不少是晚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近代档案最为丰富,藏有3个全宗的南京临时政府档案、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档案600多卷,70多个全宗的北京政府档案15万卷,近700个全宗的南京国民政府档案130万卷,102个全宗的汪伪档案12万卷;另有缩微胶片,其中,国民政府行政院19380卷,国民政府(总统府)11584卷等。中央档案馆集中保管自“五四”运动以来的,具有全国意义的革命历史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中央机关的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档案。该馆馆藏

档案80余万件,资料80余万册,其中相当部分属于近代档案。

2.文献汇编

近代历史文献资料的汇编成果显著,重要的有晚清时期的《邸抄》《京报》《官报》,民国时期的《临时政府公报》(1912.1—1912.4)、北洋政府的《政府公报》(1912.5—1928.6)、国民政府的《国民政府公报》(1925.7—1948.5)、《总统府公报》(1948.5—1949)等。这些官方公文汇编中所载训令、布告、咨文、公函、电文等各种文体皆是研究公文的一手文献。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汇编的与公文相关的资料有《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5年版)、《清末各地开设文报局史料》(《历史档案》1999年第2期)、《光绪年间江南织造驻京人员呈堂禀稿》(《历史档案》1998年第三、第四期)、《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清代文书档案图鉴》(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曾挑选一批民国时期的重要档案汇编成《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共五辑90册。这是国内目前最庞大的一套档案史料汇编。此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还编有《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等。中央档案馆汇编的文献资料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1931~1945)》(中华书局1990年版)等,还有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办的以公布档案资料为主的刊物《党的文献》。

太平天国方面的资料汇编成果也很多,比如,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写、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1963年版)、《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979年版)和《太平天国资料

汇编》(1980年),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所编《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王庆成编注的《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萧一山所编《太平天国诏谕》(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1912年印行),余炳坤所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静吾、仲丁所编《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茅家琦所编《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等,其中有不少史料直接涉及公文和文书制度。这些汇编资料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公文原件,还包含与公文内容相关的背景性史料,为认识公文与社会活动的关系提供了便利。

3. 文书工作资料汇编

除了上述文献资料,学界还专门汇编了与文书工作相关的资料集。一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民国时期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资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主要搜罗民国时期的法令性文件。二是中央档案馆的《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文件选编(1923~1949)》(中国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主要收录1949年前我党在文书、档案工作方面的一些历史文件,还有一部分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人民解放军、人民团体有关的文件。三是北京市档案馆的《民国时期北京文书档案工作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这些汇编集中了公文方面的法规文件,对近代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研究者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二)对特定时段公文的研究

特定时段是指在中国近代先后出现的晚清、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南京国民政府等几个历史阶段,可以概括为晚清和民国(包括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两个时段。

1. 对晚清公文的研究

除后面言及的太平天国公文外,专门针对晚清公文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学术布点也较

零散,相对集中的研究话题是晚清的政治、文化新格局与公文的关系,检索到的论文有侯吉永的《简述晚清立宪运动下封建公文的新变化》(《档案》2013年第2期)和《晚清电报的引入之于公文现代化的意义》(《历史档案》2010年第4期),丁清的《晚清外交文书变化再审视》(《兰台世界》2013年第22期),郑明浩的《试析晚清时期中朝间公文的传达体系——以天津海关为中心》(《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但在围绕晚清的某种公文文体所作的专门研究方面,成果却很丰富,最有影响的是李育民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2011年出版的“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包括《近代中外条约研究综述》《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近代中外条约关系刍议》《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1835—1937)》《列强在华租借地特权制度研究》《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近代领水主权问题研究》《李鸿章与晚清中外条约研究》《晚清中英条约关系研究》《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冲突》《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1919—1931)》《晚清中国与国际公约》等12本。另有金玲的《明清邸报研究》(云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樊晓宇的《咸丰朝“邸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2. 对民国公文的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文书学发端。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公文研究方面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有100多种),但其编著目的大多是为参加文官考试的人员和新入机关人员普及文书知识,内容偏重于公文书式、公文作法、公文用语。比如王尹孚所编《国民政府现行公文书式详解》(上海法学编译社1930年版),法政研究社所编《最新标准公文书式》(新亚书店1940年版),段世源编著的《新公文书式大全》(华星书局1944年版),孔仲文所编《现代公文书式》(光明书局1946年版),朱翊新所编《现行公文书式集成》

(世界书局1946年版),等等。这些著作类似现在的公文写作教材,学术价值不高。只有徐望之编著的《公牍通论》(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对民国公文的类别、体例、结构、叙法、用语、程式等方面的演变情况作了一定程度的学理探讨,并附录了一些当时的公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只是其研究范围仅限于民国前期的公文。

许同莘的《公牍学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是民国时期水平最高的公文学著作。该书对上古三代直至明清的历代文书及文书工作历史进行梳理,列举各代的范文展开分析与评论;外有两篇名为“牍髓”的专论,论述文书工作者的修养、情操及文书撰拟技巧等;最后还附有“治牍须知”,讲述拟写公文的注意事项。作者从“政与学”“政事与文章”的高度,以互相贯通的观点研究文书与文书工作,注重文书内容,考究文风格调,将文书工作从刀笔俗吏的操业谋生、以程式为目的等的陈旧见解中解脱出来,把历史上大量的或个别的文书工作经验,总结、提高为系统的文书学理论。虽然该书的研讨对象是近代之前的公文,但其研究方法足资借鉴。

1949年后的几十年间没有出现有关民国公文研究的专门著作,进入21世纪后情况大为改善,首先出现的是王铭的《文种钩沉》(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和裴燕生主编的《历史文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两种。二者虽然不专以民国公文为研究对象,但都有大量篇幅涉及民国公文。前者由公文原件出发进行细致的文本解读,介绍民国公文的文种演变、结构程式与行款格式,有很强的说服力。后者用了整整一篇讲解民国文书工作制度发展演化,按专题介绍了文种、程式、撰制、处理、制度改良等各方面情况和特点,基本展示了封建文书制度向现代文书制度发展的概况。此外还有沈蕾所著《民国时期公文书式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以民国时期公文为研究对象的专门著作”,“以现存的民国时期档案和当时出版的大量公文著作作为

主要材料依据,并参考了大量现代学者的研究文献,对当时公文的定义、文种、公文的署名、盖印、编号、计时,以及公文的纸式、文体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研究”。^[1]

论文方面,近年来民国公文渐为年轻学者关注。在这些学者中,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侯吉永是引人关注的一位。2009年至2015年,侯吉永在《档案学通讯》《历史档案》《档案与建设》《档案时空》《档案》《汉语言文学研究》《秘书之友》等期刊上发表论文近30篇,如《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中的公文纸式及程式变革述论》《中国公文书式的现代化转型研究(1912—1949)》《试论民国公文缮写程式的演进》《简论民国公文的旧式套语及其简化进程》《简述报纸刊布公文的历史兼论其对公文转型的意义——从唐宋邸报到晚清官报再到民初公报》《论民国公文纸面结构的演进》《漫谈民国公文装叙结构的演进》《民国公文的白话化转型》《试述民国公文称谓格式的演变》等。这些论文围绕民国公文的现代化转型这一主线,对该时期公文的程式、格式、语言、纸式、标点符号、印章等进行全面、深入的研讨,还对通电、委任状、通缉令等民国文书进行研究。

王学胜的《民国时期行政公文研究》(长春理工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张敏的《北洋政府时期文书档案制度及其实践》(扬州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聂萌的《论民国时期(1911—1949)机关文书档案工作的形成与发展》(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对民国公文有集中讨论,但基本属于概况性介绍,过多依赖于二手文献《民国时期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资料选编》,针对法令进行二度汇编,在深度和新颖性方面都有待掘进和提高。

其他单篇论文约有150篇之多,比如董俭的《浅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档案学通讯》1989年第5期),黄昆源的《略论南京临时政府的公文改革》(《中南民族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王铭的《民国公文标点、分段的演变和意义》(《档案与建设》2002年第9

期),杨璐的《简析北洋政府时期的公文管理制度》(《山西档案》2004年第1期),傅荣校的《论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文书档案改革》(《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1期),丁海斌、孟晓姣的《民国时期文档名词研究》(《档案》2015年第4期),陈艺璇的《民国时期的公文盖印和署名模式》(《秘书》2016年第6期),等等。

另外,1949年后出版的公文史、文书工作史、档案史、秘书史等方面的著作中也有与民国公文相关的内容。比如,潘嘉的《中国文书工作史纲要》(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费云东的《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1921~1949)》(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闵庚尧的《中国古代公文简史》(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吕发成的《中国公文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丁晓昌的《中国公文发展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李昌远的《中国公文发展简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周雪恒的《中国档案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杨剑宇的《中国秘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聂中东的《中国秘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等。以上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谈古代公文多以清代为时间下限,谈现代公文多以1949年为时间上限,普遍忽视近代公文。个别著作虽然谈及近代公文,但其内容并不作为重点章节。而且,这些著作基本上是对历代公文种类、公文制度等进行描述,只完成了“历史还原”的工作,系统深入的“逻辑论证”环节有待进一步开展。

3. 对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公文的研究

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公文实践具有鲜明的特色,不仅在近代公文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为新中国的公文制度奠定了基础。对1949年前中共公文的研究,除党史方面常常以党的公文文献为资料对相关历史问题展开研究外,主要涉及对文书和档案工作方面的研究。一是对这一阶段的中共文书和档案工作进行全面介绍和研究,代表性著作是费云东、潘合定编著的《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1921—1949》(档案

出版社1987年版),另有胡明波的《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的现代化进程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二是对某一具体时期(如抗战时期)或某一具体地方政权(陕甘宁边区)的中共文书和档案工作进行研究,如张素慧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公文改革》(《档案学通讯》1986年第3期)、唐铨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文书处理与档案工作》(《陕西档案》1994年1期)、王兰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文书工作》(《秘书之友》1996年第2期)、侯吉永的《反思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公文改革》(《档案》2014年第2期)。

(三)对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公文的研究

对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公文的研究主要有太平天国公文研究、行政效率运动公文研究、禁烟公文研究、洋务运动公文研究等几个热点。

1. 对太平天国公文的研究

太平天国公文研究在近代公文研究中独树一帜,成绩斐然,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可圈可点。有学者统计,涉及太平天国公文的论文从1963年—1991年就已达200多篇。近年来则有庄建平的《太平天国的路凭》(《历史教学》1987年第8期)、王兴福的《太平天国门牌的若干问题》(《浙江学刊》1989年第5期)、霍应希和石巨文的《太平天国公文概述》(《秘书之友》1992年第12期)、张铁宝和吴瞻的《刘丽川上太平天国天王奏折考》(首届“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6年)、吴善中和韩荣钧的《刘丽川上天王奏考》(《扬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2期)等,涉及太平天国公文的某种制度或某一文种的研究。此外也有学生将太平天国文书研究作为学位论文选题,如闫晶的《太平天国公文特点》(长春理工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胡烨晔的《太平天国宣传策略研究》(华中科技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董婷婷的《太平天国宗教避讳词语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王舒雅对太平天国公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

研究,除《宗教视野下的太平天国公文》(南京师范大学 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和《太平天国公文研究》(南京师范大学 2014 年博士学位论文),还在相关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比如《太平天国公文语言的特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 年第 4 期)、《太平天国时期的公文写作改革》(《写作》2017 年第 1 期)、《太平天国的宗教仪式公文》(《兰台世界》2011 年第 8 期)、《宗教对太平天国公文文种的影响》(《兰台世界》2012 年第 1 期)、《太平天国公文与同时代清朝公文的相似性》(《兰台世界》2015 年第 8 期)、《太平天国的伪造文书》(《山西档案》2015 年第 3 期)、《太平天国文书中的军粮问题考》(《农业考古》2012 年第 3 期)。

关于太平天国文书及其制度的研究,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专著很少,朱从兵、崔德田弥补了这一空白。他们在《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中详细描述了太平天国的办公机构和办文人员、文书的行文关系和格式、公文的承办与运转机制以及用语特点,并分析了太平天国文书制度的历史作用,勾勒出太平天国公文制度的全貌。朱从兵则在《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再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中用个案研究的方法详尽解读《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深入解析太平天国文书制度的构建情况,分别对太平天国的文书系统、文书人员、文书机构、文官制度、告示运用等进行分析。特别是将太平天国文书归纳为宗教文书系统、军政文书系统、经济文书系统以及特殊文书系统进行研究,并通过告示这一文种的使用分析太平天国的文书制度。这些角度都很有新意,将太平天国公文研究推向了更高水平。

2. 行政效率运动公文研究

李章程的《民国时期的公文改革与行政效率(1912~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是一部特色鲜明的著作。作者认为,在“民国时期各政权为提升行政效能所进行的各项行政改革中,公文改革往往事涉其中”,因此在研究

中将公文改革与行政效率结合起来,“从公文机构、公程式、公文处理及公文人员四个维度对民国不同时期的公文改革与行政效率进行了较详细的梳理,探讨公文改革在哪些方面提升或改善了行政效率,对行政效率的提升或改善的程度如何”。^[2]

高燕的《“行政效率运动”与中国近代档案学》(安徽大学 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虽然是从档案学角度入手,但由于公文与档案有着密切关系,势必言及公文。文章讨论近代档案学的产生这一特定事实对“行政效率运动”的影响,介绍引发“行政效率运动”的内因和外因以及“行政效率运动”的主要情况,主体内容是“行政效率运动”与近代档案学的产生之间的相互影响。

3. 洋务运动和禁烟运动公文研究

关于洋务运动公文的研究,仅有林瑜洁的《洋务运动时期外交公文研究》(南京师范大学 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对洋务运动中使用的外交文书的种类、语体特点、撰拟和办理、主题和思想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对禁烟公文进行专门研究的只有陈妙闽一人,作者在《林则徐禁烟公文研究》(南京师范大学 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论林则徐谕体类禁烟公文的语用策略》(《兰台世界》2011 年第 3 期)、《论林则徐禁烟公文的谋篇布局之道》(《兰台世界》2014 年第 8 期)中从文书学角度对林则徐禁烟公文的文体种类、主题内容、文本技巧等进行探讨,并结合社会研究对该类公文的社会影响进行评说。

(四)近代公文研究的特点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看出,近代公文研究具有以下鲜明特点。一是资料丰富。既有大量的历史档案和历史文献,也有众多的专题资料汇编。这些资料为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条件。二是多学科交叉。研究涉及历史学、档案学、文书学、行政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研究视域开阔,不同学科的学者可以互相交流、借鉴,扬长补短。三是时段性特征明显。从民国至今,近代公文研究有两个高潮期。第一个高

潮期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大量的公文研究方面的教材和著作,更出现了《公牍通论》和《公牍学史》这样的代表性著作。这一时期的繁荣一方面是受时代环境的影响,由于服务封建王朝的“古代公文系统”已被打破,亟需建构一个适应新政府的现代公文系统;另一方面则得力于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改革运动”,这一运动直接促使学者们关注文书和档案工作的研究。第二个高潮期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很多学者尤其是一批青年学者投入近代公文的研究,这主要得力于近二十年来我国秘书学、档案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一大批文书、档案专业人才成长起来,壮大了学术研究队伍。其他时间阶段,比如 1949 年后的 40 多年,有关近代公文的研究成果很少,而且多数作为秘书史、公文史、档案工作史等著作中的部分章节,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

二、公文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学术趋势

(一)近代公文研究的不足

由于公文研究向来不为学界所重视,因此整体水平较低,近代公文研究与较受关注的古代公文和现代公文研究相比,更是一个薄弱环节。近代公文研究尚存在很多不足,需要反思和改进。

1. 系统性不强

对近代公文整体进行全程、系统研究的结果甚少,所见仅有周俊红的《近代中国行政公文的演变及其规律》(河北师范大学 2004 年硕士学位论文)。文章从时段上将近代行政公文分成晚清的行政公文和民国时期的行政公文,分别从文种、公文机构及文书处理程序、书写格式及要求、公文的稽察制度和保密制度、递送公文的方式等方面叙述近代公文的大致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归纳近代行政公文的演变规律,指出“行政公文与国家政体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二者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则存在时间切段上的

断续和关注点不均衡等问题。从时间上看,对民国公文的关注相对较多。晚清在时间上几乎占据了近代的 2/3,但学界对其公文的关注却甚少,即使有所涉及,也仅限于太平天国运动、禁烟运动、洋务运动等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不仅如此,对 1949 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公文研究也很不充分。从关注的话题看,关于民国公文的程式和语言、民国公文法规等内容的论文数量很多,选题雷同,内容也大同小异,而对民国公文的其他方面,比如与文学的关系、与新媒体的关系等关注甚少。近代公文处在由“古代系统”向“现代系统”过渡和转化的过渡地带,只有对其进行整体性的系统研究,才能描绘出演变过程,揭示出演变规律。对重要个案和节点进行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缺乏宏阔的眼光,不是将其放置于中国公文演变的全程中去考察,往往会“小事明白、大事糊涂”。

2. 深度不够

通观现代公文学界的各种研究,知识性、概括式介绍和现象描述较多,深层分析较少,用于知识和技能传授的教材较多,综合性专题论著较少,因此学术水平普遍较低。这一情况不仅存在于近代公文的研究中,在古代公文和现代公文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公文不仅是治理社会的工具,还兼有文学、史料、新闻、政论等多种属性,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值得也有可能从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管理学、传播学、信息学、哲学等多角度对其进行多层面的挖掘和探索,通过丰富的现象揭示出背后的规律,展示公文的多重价值和魅力。在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二)近代公文研究趋势

尽管近代公文研究还存在着种种不足,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相比过去的几十年,近一二十年来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而且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值得关注的趋势。

1. 系统化研究呼之欲出

近代公文的一些重要阶段和重要方面的研

究成果渐多,民国时期公文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晚清公文研究也有一些成果,尤其太平天国公文更是备受关注,而有关中共公文的研究也在逐步展开。虽然将这些成果连缀成片进行系统化梳理和研究的成果尚未出现,但已经具备初步基础。

2. 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尽管近代公文研究的水平还有待大幅提升,但一些专题性成果已经显示出深入掘进的明确趋向,比如在公文形式、太平天国公文、公文与行政效率改革的关系、1949年前中国共产

党的公文等专题研究方面,已经出现了一批颇有分量的著作,其他方面的专门著作也值得期待。

3. 交叉研究的趋势将继续强化

公文具有多种属性和价值,为多学科的介入提供了先天条件。目前,已有历史学、档案学、文书学、管理学、文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进入近代公文研究领域,这种“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格局会随着各学科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日益频繁的互通而得到保持和强化。

【参考文献】

- [1] 沈蕾.民国时期公文书式研究·内容简介[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尾页.
- [2] 李章程.民国时期的公文改革与行政效率(1912~1949)·内容简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扉页.